

河洛书院文化系列学习选刊

书院故事

第 14 期（2022 年）

河南科技大学河洛书院编

2022 年 9 月 8 日

前 言

自唐初至清末近 1300 年，7500 余所中国书院，遍布华夏广域，以求学问、成人之教、文武担当、经世致用为所求，创布德传道、人文化成、育才兴邦、服务天下之壮举，延东方之文脉，垂青史之典范。

书院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独特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在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本学习选刊，将通过精选并讲述一系列中国古代书院故事，以期为大家体味、认知和理解“真”的过去，不忘本来传承千年书院的文化血脉，面向未来开创新时代大学书院制改革中国特色之路，引发思考，提供帮助。

为保证年代准确、史料真实和故事翔实，编者查阅了大量图书报刊网络百科文献资料，引用了相关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，在此一并说明和致谢。因水平所限，其中差错在所难免，诚待敬启者批评指正。

濂溪书院：咏莲比德 弘道笃行

濂溪书院，前身为濂溪书堂，始建于宋嘉祐六年（公元1061年），位于江西九江庐山山麓，由理学鼻祖周敦颐所创。除此之外，自宋至清代，为纪念周敦颐兴教办学、传播理学的人文化育之功，全国各地特别是江西、湖南各地，以“濂溪”命名的书院，如郴州汝城濂溪书院等，还有以“景濂”“宗濂”“清濂”命名的书院，有数十处之多，可见后世对周敦颐及其肇造理学思想的景仰之情。

—

周敦颐（公元1017-1073年），字茂叔，原名敦实，号濂溪，湖南道县人。宋天圣七年（公元1029年），十四岁的周敦颐辞别父母，择岩洞而居，专心读书思考。十五岁时，周敦颐父亲去世，他随母亲到衡阳投靠舅舅郑向（龙图阁学士）。见周敦颐酷爱白莲，郑向便在自家宅前的西湖凤凰山下构亭植莲，供周敦颐负笈其间参经悟道。景祐三年（公元1036年），郑向把朝廷恩荫、准许一名子弟出来做官的机会给了周敦颐，周敦颐就此当上了朝廷将作监的主簿。此后，周敦颐先后在洪州（属江西）、大余（属江西）、虔州（属江西）、郴州（属湖南）、合州（属重庆）、星子（属江西）等地，任县令、大理寺丞、太子中舍、判官、提点刑狱、知南康军等职。熙宁六年（公元1073年），周敦颐终老隐居庐山莲花峰下（属古江州，今属江西九江），遗嘱子孙为江州人，子孙以此为家。

周敦颐早年远离故乡，长期在江西为官和从事讲学授徒活动，对庐山之美异常喜爱，便有结屋侨寓此地之意。宋嘉祐六年（公元1061年），周敦颐迁国子监博士，通判虔州（今赣州市），公务之余，在庐山山麓筑书堂，辟为会友读书著述之所，遂寓名濂溪，始称濂溪书堂，亦称濂溪祠，为濂溪书院的前身。熙宁四年（公元1071年），周敦颐重回江西任职，后退职隐居濂溪书院，一则讲学授徒，二则潜心著述。期间，他写下了《太极图说》《通书》等宋代理学的开山篇，影响甚大。从周敦颐

在濂溪书堂讲学伊始，**理学就成为书院教育的理论指导，书院成为传播理学的文化宝地**，理学与书院有了不解之缘。历史上，许多名人到九江濂溪书院，或求学、游学，或寻访、拜谒，可谓连绵不断，诸如黄庭坚、苏轼、“二程”、朱熹、王守仁等都曾在此驻有足迹。“二程”被父亲程珦送至濂溪书院，拜周敦颐为师，后来都成为声名煊赫的大理学家。朱熹作为再传弟子，怀着对先师的敬仰之情，于淳熙四年(公元1177年)及以后两年，遍访周敦颐当年在江州、庐山、南康的遗迹，修缮周的旧居，撰《濂溪先生祠堂记》《濂溪先生画像记》，建“爱莲碑”，题“爱莲匾”，还带白鹿洞书院的生徒到山北拜谒濂溪祠，**“我率诸生拜祠下，要令今古播清芬”**，可见其虔诚参拜的情景。宋元之际翰林学士吴澄，曾在濂溪书院一边讲学，一边研读院中藏书，研究理学，知名一时。九江濂溪书院绵延800余年，历代屡有修整，数易其址，称谓亦多次变更。

宋嘉定十三年(公元1220年)，为表对周敦颐的感念之情，汝城乡民在县城西郊桂枝岭麓修建了濂溪书院。那么，周敦颐与汝城又有着怎样的关系，汝城乡民为什么要感念周敦颐呢？据史书记载，庆历六年(公元1046年)至至和元年(公元1054年)，周敦颐一直在郴州郡的郴县、汝城县任职，这个时期是周敦颐理学思想孕育、形成的重要时期，也是他利用旧有的县学兴教办学、传播理学的重要时期，理学思想融入到了地方治理的实践中，融入了当地的寻常百姓家。在理学精义的化育下，县内人文蔚起、文运昌盛，政治清明、政通人和，百业兴旺、民情淳朴，产生了域内外的社会影响和深远的历史影响。汝城濂溪书院创建后，历代名师在此传道授业，理学精神代代传承，濂溪遗韵历久弥光，宋代状元朱经贵、左中大夫朱辂，明代两广总督、太子太保朱英，监察御史范辂，工部尚书曾鉴，清代翰林何庆元、著名诗人郭远等，一大批经天纬地之才脱颖而出。汝城**“御史世家”不绝如缕**，如宋代的邵晔与朱辂，明代的朱海与朱守恕父子等。汝城古祠堂700余座，大多数在命名上都彰显了理学精义，祠堂大门两侧或大堂之上的楹联或匾额都体现着**“忠孝廉节”的理学精神教化**。濂溪书院、濂溪理学思想涵育了古今汝城人一种清正廉洁、刚正不阿的人格秉性，当代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

朱良才、李涛等，均出生于此地，成长过程中受到濂溪书院的文化熏陶，后投身革命大潮，迈向辉煌人生。汝城濂溪书院，因与周敦颐的独特渊源关系而建，几经盗火，数异其址，数度修葺，文气沛然，精神永存。

二

儒学是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之一，由孔子创立，核心要义是讲大一统，讲仁义礼乐。从汉武帝开始，“推明孔氏，抑黜百家”，儒学就一直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的官方学说。即便如此，儒学作为一种学说，儒家作为一个阶层，儒教作为一种信仰，其社会地位并不是牢不可破的。魏晋南北朝时期，儒家学说的统治地位开始削弱。唐代，虽以儒学思想为主导，却也受到了佛教、道教的渗透。宋代，经周敦颐、程颢、程颐、张载、陆九渊、朱熹等各位大儒的继承、改造与完善，形成了一套更加完备、生命力更强的新儒学体系，即程朱理学，终于大放异彩，成为稳如泰山不可撼动的正统和主流哲学思想。直到近代的“五四运动”，儒学的统治地位才被彻底取消。

周敦颐，濂溪先生，**上承孔孟，下启程朱，延传儒学，开创理学**，从而受尊为理学开山鼻祖，在我国思想史、教育史上享有重要地位。周敦颐的“发端之功”：一是**哲学思想的贡献**。周敦颐在其哲学著作《太极图说》《通书》中，对《老子》《易传》《中庸》以及五行阴阳学说等思想进行了熔铸改造，进而提出了无极、太极、阴阳、五行、动静、主静、至诚、无欲、顺化等理学基本概念，并作出新的论断。在周敦颐看来，“诚”首先是宇宙存在的根据，即天道本体论；“诚”又是人的伦理道德的突出表现，即心性本体论。从天道推演出人道、天人合一之道，从而建立了以“诚”为本的伦理道德学说，把儒学向前推进了一步，为后世的理学家反复讨论和发挥，构成理学范畴体系中的重要内容。二是**政治思想的贡献**。周敦颐把理学思想融入社会治理，形成了德治与刑治相结合的政治思想。在周敦颐看来，德治就是修圣德，“立人之道，曰仁与义”，仁义修而万民感化；重师道，“师道立则善人多，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”；推礼乐，“礼，理也；乐，和也”，礼的实质

在于理，“理”的本意在于治。刑治是为弥补道德的不足而采取的万不得已的选择，德刑为先，慎刑为要，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轻易使用刑治。三是**教育思想的贡献**。周敦颐使是理学思想与书院教育相结合，十分重视儒学经典，始终将“诚”放在育人最显要的位置，强调“教人向善，进德修业”的教育目的，“六经为主，以诚为本”教育内容，“自学为主，重在启发”的教育方法，坚持开明开放的教育主张，创办的濂溪书院在中国书院史、教育史、哲学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独特地位，在理学发展史上，更**处于其他书院所无法比拟的核心、灵魂和渊源**的显赫位置。

三

“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。”这句千古名言，出自周敦颐的《爱莲说》。“说”是古代的一种文体，其它常见文体还有记、序、书、志、传、表、铭等。“记”是一种散文体裁，如碑记、游记、杂记；“序”亦称“叙”，主要有“赠序”和“书序”；“书”即信函，或著作；“志”指记事的书或文章，如地方志、墓志和《三国志》等；“表”主要是朝臣写给君主的奏章和呈文，如《出师表》《陈情表》；“铭”是刻在器物上用来警戒自己或者称述功德的一种文体，如《陋室铭》。“说”类似于现在的杂文，借物抒情，托物言志，托物寓意阐述事理。那么，周敦颐为什么会写《爱莲说》呢？

周敦颐自小志存高远，常坐莲池参经悟道，尤其对白莲情有独钟。做官后，他自号濂溪，创建的濂溪书院内凿有“爱莲池”，甚至把晚年寓居屋前的溪水命名为濂溪，这个“濂”是廉洁的“廉”加上“水”作偏旁，不言自明对于“清廉”的崇尚之意。周敦颐虽身居官场，却始终“为政精密，务尽道理”，清廉勤勉，一生不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。嘉祐八年（公元1063年）5月间，周敦颐与文朋诗友相约写诗作文，兴致所至，一气呵成，挥笔而就千古名篇《爱莲说》。**《爱莲说》全文一百一十九个字，精炼简短，结构严谨，笔意超越，言简意赅，情景交融，其采用“借影”笔法，以莲自喻，字字珠玑，有着深邃的思想内涵。**首

先，周敦颐以莲的不染、莲的不妖、莲的气度、莲的风节，莲的“中通外直，不蔓不枝，香远益清，亭亭净植……”，寄予自己对理想人格的肯定和追求，表明自己襟怀淡泊、洁身自好的人生态度，清廉正直、不甘屈服于世俗的高尚情操，以及对追逐名利、趋炎附势的世风的鄙弃。其次，周敦颐将菊花、牡丹与莲花作比，**菊花代表隐逸，牡丹代表富贵，而“莲，花之君子者也”**，寓意道德高尚的人、积极入世的人、担当有为的人、奉献于社会的人、不逃避责任的人，清楚地阐明了自己的理学思想。那就是入世而不入俗，通情达理而不故作清高，积极做事又保持名节，“可远观而不可亵玩”。

“濂溪”寓意清廉，“爱莲”寓意廉洁，《爱莲说》又何尝不是“爱廉说”，实属周敦颐一生清廉自守的真实写照。《爱莲说》是我国古代文章之精品，历来为人所传诵。淳熙六年（公元1179年），朱熹任南康（今星子县）郡守，得到周敦颐曾孙周直卿送赠的家传《爱莲说》墨本，于是在濂溪书院莲池旁壁上摹刻了此文，得以流传千古。

四

后世的黄庭坚、朱熹、黄宗羲等，都对周敦颐给予了很高的评价。宋代著名文学家黄庭坚说：“茂叔**人品甚高，胸中洒落，如光风霁月。**”朱熹称赞他说：“不卑小官，职思其忧。”“短于取名，而乐于求志；薄于邀福，而厚于得民；菲于奉身，而尚友千古；闻茂叔之风犹足律贪。”清代学者黄宗羲评价道：“孔孟而后，汉儒止有传经之学，性道微言之绝久矣。元公崛起，二程嗣之，又复横渠诸大儒辈出，圣学大昌。故安定、徂徠卓乎有儒者之矩范，然仅可谓有开之必先，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，端数元公之破暗也。”濂溪先生为人的光风霁月，为官的正清廉洁，为学的开端之功，值得今人学习传承与发扬光大。